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——阜新“新乡贤”自费创办农家书屋的文化样本



△张国梁(左一)创办的增益书屋

辽西大地,4月春风拂过医巫间山余脉,也拂过一座座散落在乡野间的农家小院。

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,有两座书屋悄然走进人们的视野。它们不在县城,不在乡镇文化站,而是藏在村庄深处——一座在排山楼村的山脚下,一座在佛寺村的瑞应寺旁。

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:退休干部回到父母留下的老宅,用自己的积蓄、自己的藏书、自己的半生心血,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民间书屋。

这不是行政任务,不是考核指标,不是“农家书屋覆盖工程”的报表数字。这是一种主动的、自发的、带着体温的“文化还乡”。

在全民阅读周来临之际,我们走进这两座书屋,也走进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:当一批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告别职场,他们并没有选择安逸的退休生活,而是带着半生积淀,回到生养他们的土地上,点亮一盏盏乡野书香之灯。

两个人,一条归乡路

张国梁,退伍军人,在市税务局工作了38年,退休后仍担任市税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告别职场后,他没有留在城里,而是回到新民镇下排山楼村,守着父母留下的老宅,把半生积蓄与收藏,一点点安放在这里。

佟立,退休教授,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家,主编百余种中小学民族语文教材,曾获国家及省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。2022年退休后,他舍了城市的安逸,回到佛寺村,自筹资金修缮旧宅,将毕生两万册藏书悉数搬回,又陆续添至四万余册。

他们的人生轨迹惊人地相似:都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,都在各自的领域勤恳耕耘了半生,都在告别职场后选择回到故土,都把自己最珍贵的财富——书,带回了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。

他们不是“老人”,而是刚刚退休、经验与精力俱在的“壮龄人”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退休意味着放下工作、享受生活。而他们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:把职业生涯积累的能力、资源与热忱,从职场转向故土,开启人生的“第二篇章”。

排山楼村的山脚下,张国梁的旧院里,农耕文化传承馆的犁铧生着锈,雷锋文化传承馆的藏品静静陈列,增益书院的数万册书把老宅填得温厚充实。

佛寺村的瑞应寺旁,佟立的“禾土农家书屋”里,党建、文史、农技、少儿读物一应俱全,四万余册藏书构成了乡野

间一座微型文化宇宙。

他们没有豪言壮语。张国梁只说:“老物件记着历史,旧时光藏着乡愁,要让后来的人知道根从哪里来。”佟立说:“书屋取名‘禾土’,蒙古语意为‘火镰’,愿这书屋如一把老火镰,擦出知识的星火。”

为什么是“他们”? ——“新乡贤”现象的时代注脚

张国梁和佟立并非孤例。在阜新,在全国,正悄然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:退休返乡的知识分子。



△佟立(左二)创办的禾土农家书屋

他们有共同的身份标签:退休干部、退休教师、退休教授、退休工程师……他们从乡村走出去,在城市工作生活数十年,积累了知识、见识、藏书和人脉。退休后,他们没有选择留在城市,而是回到出生地,用各自的方式反哺故土。

这并非“发挥余热”的被动选择,而是“再出发”的主动规划。

从时代背景看,中国城市化四十余年,大量乡村精英流向城市。如今,第一批“60后”陆续告别职场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,开始思考“我从哪里来”这个终极问题,并付诸行动。与上一代人不同,他们退休时身体尚好、经验丰富、资源充足,完全有能力开启新的事业。

从情感驱动看,他们与故土的情感联结从未断裂。父母留下的老宅、童年记忆中的土地、血脉里的根——这些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具体可感的牵挂。张国梁守着“父母留下的旧院”,佟立修缮的是“父母旧宅”。老宅不仅是物理空间,更是精神原乡。

从文化自觉看,他们深知乡村振兴不仅是钱的问题,更是“魂”的问题。乡村可以建起崭新的楼房,可以修通宽阔的马路,但如果精神空虚、文化贫瘠,乡

村终究留不住人,也安放不下乡愁。张国梁说“让后来人知道根从哪里来”,佟立说“要让乡土文脉在坚守中绵长”——这是一种超越物质的文化远见。

与官方农家书屋相比,民间书屋有其独特价值。官方书屋是行政推动的公共服务阵地,有统一标准、有考核指标、有资金支持。而民间书屋是个人情怀驱动的文化空间,“守”书屋的人就住在那里,这种“人在阵地在”的坚守,恰恰是官方书屋难以复制的。

他们改变了什么?
书屋建起来了,然后呢?

在排山楼村,村民从“闲时打牌”到“闲时读书”,孩子们放学后有了去处,老人翻着文史书籍消磨时光。张国梁走进校园宣讲,走进乡间传道,把一座自家小院,做成了乡土的文化风景。

在佛寺村,养牛户捧着农技书,寻得科学养殖之法,牛崽成活率提高三成;小学教师日日来查资料,打磨优质课堂;店家翻着菜谱,精进服务;老人读文史,孩子看绘本。“忙时耕田地,闲时坐书屋”成了村里的新风尚。

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的改变:文娱自娱的多了,闲散闲聊的少了;读书求知的多了,口角纷争的少了;重视家教的多了,邻里隔阂的少了;热心公益的多了,闭门愁闷的少了。

然而,民间书屋的生存并非没有隐忧。

资金可持续性是第一道坎。张国梁用的是自己的稿费 and 积蓄,佟立自筹资金。书屋不收费、不经营,全靠个人“往里贴”。一年两年可以,十年二十年呢?他们刚刚退休,尚有精力与收入支撑,但长远来看,需要更可持续的机制。

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尤为关键。官方农家书屋有财政补贴、有图书更新机制、有考核督导。而作为民间书屋,它们既不是正式的文化场馆,也不是商业机构,“名分”不清,支持上有难度。

传承的难题不容忽视。书屋创办者终有精力不济的一天。这些书屋谁来守?那些藏书、藏品去向何处?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传承机制,民间书屋很可能“人在书屋在,人去书屋空”。

这些问题,不是两位创办者自己能解决的。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,需要得到政策的关注,需要探索“民间创办、社会支持、志愿接力”的可持续模式。

有专家建议:将符合条件的民间书屋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,给予适当补贴和业务指导;建立“新乡贤”支持机制,鼓励退休人员返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;探索“志愿接力”模式,让年轻人参与书屋运营,实现代际传承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全民阅读周,我们谈论阅读,谈论书香,谈论“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”。

但我们必须看到:全民阅读,不能只盯着城市。乡村的书香,更需要有人去点燃。

张国梁、佟立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告别职场后,没有选择安逸,而是选择了“再出发”——用半生积蓄、毕生藏书、一颗赤子之心,在辽西大地上点亮了一盏盏文化之灯。

这不是轰轰烈烈的工程,而是润物无声的坚守。它告诉我们:乡村振兴,最深的根基在文化;文化振兴,最真的力量在人心。

夕阳落下来,排山楼的山影拉得很长。金矿静了,古碑静了,只有那座旧院,书香淡淡,灯火温软。

暮色漫上来,佛寺村归于静谧,唯有禾土农家书屋的灯亮着,暖黄微光透过窗棂,洒在瑞应寺旁的街巷,柔而坚定。

这灯,是知识的温度,是故土的深情,是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最好注解。

愿更多“新乡贤”踏上归乡路,愿更多民间书屋在乡土上扎根。

(阜新日报记者 白鹏)



△禾土农家书屋